

本刊「二十一世紀評論」欄目將就「中國自由主義的邊緣化」、「中國發展模式的反思」、「中國民主化的困境」等題目展開討論，歡迎海內外作者參與。  
——編者

#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 威權政府與宗教信仰

邢福增的〈民間組織政策與中國基督教〉（《二十一世紀》2009年8月號）一文，實際上給威權政府提出了一個問題：怎樣讓宗教褪掉政治色彩，使之回歸其本身，亦即怎樣在宗教自由方面與國際達成共識。

威權政府適應了中國人長期自虐的一種生理與情感上的需要，因此它時常以嚴父與慈母的雙重面相出現。棍子加麵包的管治方式，強化了威權政府雌雄同體的這種特色。任何宗教信仰想要在這塊土地上獲得生存權，就必須認同現有的治者與被治者之間的關係，並努力改造自身，融入此關係之中。基督教的傳入與發展無疑也面臨着這樣的問題。這與一直以來宗教與權力之間的曖昧關係有關。

在帝王與郡縣間權術大比拼的時期，宗教並不僅僅是單純的信仰，還是一種煽動民眾進行奪權的工具。因此建國初期，對一個以準宗教的動員形式奪權上台的政府來說，對宗教的控制與防範就自然而然了。此時，新政府認為自己有能力提供出一套完備的意識形態來解決民眾的信仰問題。然而，當毛時代過渡到鄧時代之

後，改革所解放出來的物質與資本的力量，使得傳統的意識形態無法自圓其說。信仰領域的空白，呼喚着各種宗教的重新介入。然而，在威權政府的眼中，任何新宗教的冒出或坐大，都是對現有權力格局的潛在挑戰和威脅。這種把宗教、社會、政治問題都放在一個籃子裏進行思考的執政心態和方式，使得改革在今天陷入了窘境。任何小問題的出現和解決，都牽一髮而動全身。

韓王韋 上海  
2009.8.25

成是在此年代後期任山東大學校長，他是在文革結束後出任人大校長的。還有，說艾思奇在此年代擔任過「人大副校長」；有誤，艾那時是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另外，在提及文革時期延安一代進入部長一級人物時，說何東昌任「教育部長」；何不可能在文革時期出任教育部長，他是在1980年代出任教育部長的。又說，熊復在文革時期任「《紅旗》總編」；他實際上是在文革結束後出任《紅旗》總編輯的。

唐少杰 北京  
2009.8.25

## 裴文的幾點小失誤

貴刊2009年8月號發表的裴毅然先生的〈中共勝利的基幹隊伍：延安一代知識份子〉，史料豐富，觀點鮮明，寓意直切，深中肯綮，這是筆者近些年來讀到的關於延安一代知識份子的最好論文之一。不過該論文有幾個小錯誤。在頁46上所標明的「1950年代嶄露頭角的延安一代」，指出蔣南翔在此年代任「高教部長」；不準確，蔣是在1965年出任高等教育部部長的。又云，成仿吾在此年代任「人大校長」；不對，

## 時代症候與歷史蛻化

謝泳的〈錢鍾書與清華間諜案〉（《二十一世紀》2009年8月號）一文，以一文獻個案的披露和解析，印證了一個「失魂」的大時代和企望「默存」的小個體之間不可通融的互斥關係。懸殊的力量對比決定了毫無懸念的結果：為免使畸零的「默存」被等同於自絕於時代的「默認」和「領罪」，「默存」者不得不被迫開始發聲辯誣。但與積極、主動的「寧鳴而死、不默而生」迥然不同的是，辯誣

總要以承受誣陷和認同誣陷論調所依託的邏輯語境為前提。辯誣和誣陷，形式上雖然一正一反、貌似對立，本質上卻殊途同歸，對同樣的價值核心起着同樣的強化作用。

確如謝文中所述，面對這類歷史現象，道德意義或良心層面上的追究、批判已不重要。不過，這倒並非因為在道德法庭和良心世界裏也須講究所謂「訴訟時效」，更關鍵的是因為真正的被告應該是整個時代，而非具體某事中的某人。在這一點上，吳思圍繞「生存成本」所闡發的一套「定律」，或許是更適用的思想工具。

一個知識份子集體「失魂」的時代，同時也正是整個知識份子階層的社會生存成本核算中道德的比重急劇提升的時代。反過來，一個有望為知識份子「招魂」和「還魂」的時代，同時也該是道德成本在知識份子的社會生存成本中趨於歸零的時代。否則，除了期盼像偉人說過的那樣，第一次作為悲劇出現的歷史形態，第二次將以喜劇的模樣出現，人們還能有別的甚麼更好的奢望？

李林榮 北京  
2009.8.30

## 「延安一代知識份子」的分化與中國的未來

裴毅然的〈中共勝利的基幹隊伍：延安一代知識份子〉（《二十一世紀》2009年8月號）一文說得好，「小知識份子統治大知識份子」，確實是中國的特色，不僅社會上如此，共產黨內亦然：創建共產黨的大知識份子陳獨秀被開除出黨，

張申府退黨，臨危受命的張聞天則被奪權，當令的是北大旁聽生毛澤東。陳獨秀的學生張國燾叛逃到國民黨，雖不光彩，其實不過是又一個大知識份子敗於小知識份子的例子。

產生於新文化運動的中國共產黨，雖然也受到「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啟蒙，以與傳統文化決裂的面目現身，但其實並不懂得理性、邏輯、自由、民主、人權、憲政，而挽救和振興衰敗的古老帝國的目標、「槍杆子裏面出政權」的道路，跟他們要打倒的「治國平天下」傳統卻殊途同歸。「青春使延安一代熱切地希望改變『萬惡的舊社會』；淺薄使他們能夠狂熱崇拜『導師』；小知使他們堅信『革命真理』」。

「延安一代知識份子」及其接班人，現在正遵循生活的邏輯，分化為一心捍衛既得利益的頑固派和決心衝破現有秩序的改革派。中共內部這兩派的鬥爭，將直接決定着中國、中國人和中共的命運。

虛舟 寶雞  
2009.8.30

## 「江湖」還是「市民社會」？

筆者十分欣賞楊國斌〈互聯網與中國公民社會〉（《二十一世紀》2009年8月號）對漢語互聯網所進行的簡當而具概括性的歷史考察，但對文中「網絡公民社會」的概念仍持有疑義。

改革開放以來，所謂「市民社會」在中國大陸似乎正不斷生長，漢語中有一個可與西方術語“civil society”相互對照的原生詞：「江湖」。「江湖」是傳統中國社會中獨特、具有離散和

灰色性質、外部性的公共交往空間，它與歐洲十六世紀以來隨着城市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發展所形成的公共交往空間——「市民社會」——恰好可形成鮮明對照。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江湖是中國版的「前市民社會」（pre-civil society）。

中國社會還未真正步入「後江湖時代」。借用羅爾斯（John B. Rawls）的術語，江湖上隨處可見的是「暫時妥協」，缺乏的是「信念共同體」。江湖領域中的交往行為，一方面被普遍意識到，需要或應該遵守某種行為規範（「義」）；另一方面，「義」的普適性共識又還未被建立起來。

目前的漢語世界是「江湖」而不是「市民社會」。這由三個因素所決定：（1）目前漢語文化的主體，缺乏公共信仰或超越性的維度，缺乏有效的公共信念；（2）具備「信念共同體」性質的獨立社群的發育仍處於低級階段；（3）目前中國的國家或政府體系，表面上是西方化的“republic”，實則是權能（power）超級發達、但意識形態卻發生劣變、不再具備超越性關懷之能力的新型「超會堂」。

當前漢語互聯網的表現更像「江湖」而非「市民社會」。互聯網的普及、電子鴻溝的填平，並不能必然改善漢語社會的未來。網絡是中性的，決定性的因素是社會中的行動者：他們擁有怎樣的價值觀與信念？如何組織社群、建構政府、開展社會交往活動？

戴立勇 武漢  
2009.8.27